Globethics Repository



龍與鴿子——中國的民族-國權主義與天主-基督宗教 [The Dragon and the Dove: Nation-Statism and Catholic-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Abstract)]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He, Guanghu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15 18:28:13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527

龍與鴿子

——中國的民族－國權主義與天主－基督宗教

何光滬
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博士

引子：兩個「九一一」事件

這兩個事件發生在同年同月同日，一個稍前，一個稍後，在不同的地方：

在美國，幾個心理「變態」的罪犯，用民航客機作炸彈，極端殘忍地把幾千個同他們無冤無仇甚至素不相識的人，炸得血肉橫飛，燒得無法辨認……

在中國，一些心理「正常」的青年，眼看着視屏上這幅濫殺無辜的真實情景，極其興奮地大喊大叫：「炸得好！」……

這一些年輕人同那幾個殺人犯，絕對毫無瓜葛，同那幾千個受害者，絕對無冤無仇。所以，這是兩個相互孤立的事件。

但是，二者令人心寒的程度，不相上下。後一個事件的冷酷和不祥的性質，同前一個事件一樣需要解釋、需要反思。

在此之前兩年，一九九九年春，同這些年輕人年紀相仿心理近似的成千上萬中國大學生，在對成千上萬波士尼亞人和科索沃人被屠殺幾十個月毫無反應之後，突然對本

國的幾個使館官員在制止屠殺的戰爭中被炸死做出了這樣的反應：破壞有關國家駐華使領館、包圍麥當勞餐館、圍攻踢足球時偶然碰到了「反北約」標語的日本學生……以至當時的國家副主席胡錦濤罕見地發表電視講話，呼籲防止「過激行動」！

如果用正常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可以解釋一九九九年的事件，那麼，僅僅用這兩個「主義」，卻無法解釋上述第二個「九一一」事件，更無法解釋一九九八年和二〇〇九年的這類事件：當印尼軍車載着暴徒去焚燒華人商店、毆打華人商人、強姦華人婦女的時候，在北京，只有幾十個大學生前往印尼駐華使館表示抗議；當俄羅斯軍艦攻擊中國貨船，打死許多船員，並看着落水者淹死的時候，當俄羅斯政府沒收價值幾十億美元的中國商品，迫使在莫斯科的幾萬中國商販陷於絕境的時候，在全中國，沒有一個大學生走到俄國駐華使領館去表示抗議。[1]假設這兩次事件的殺人者是西方國家的軍隊，或者受害者是有國家地位的中國人，結果會怎樣？我們甚至不敢想象！

一、中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與國權主義

在這類無可理喻的社會現象背後，是這樣一種思想現象和傳媒現象：一小群富於社會責任感和理性批判精神的中國學者所寫的反思和批判狹隘民族主義的《潛流》一書，儘管全面而深刻，二〇〇四年出版後無聲無息，而幾個強烈反西方的作者所寫的《中國可以說不》，也許因為偏激而煽情，一九九六年出版後風行一時，同樣這幾個作者所

1. 「鳳凰衛視」稱之為在俄中國商人的「九一一」。如果可以把驚人的沉默稱為事件的話，我們也需要解釋這第四個「九一一事件」。

寫的《中國不高興》在今年三月出版，到六月就已印刷了十二次！

看到這類現象，一般人都很自然地將其歸因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同世界各民族特別是西方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內涵相同、自然而正常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

這是一種表面的、過時的、錯失了要害的看法，因為它忽略了與此相關的中國語言、歷史和社會政治之特色，所以它無法解釋上面提到的不可理喻的現象——在抗議外國時不顧事實的「選擇性」，在痛惜國人時十分明顯的「等級性」。

只有「國權主義」，[2]或者「國權主義」對正常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扭曲，才能解釋這類現象。也可以說，這類現象的根源，不是正常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而是由國權主義所主導所扭曲的民族主義，我們可以稱之為「國權－民族主義」。[3]

當然，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國權主義之間總有一些深刻而複雜的關聯。但是，這種關聯在中國的歷史、社會、政治和語言環境中，具有許多在其他國家沒有的需要澄清的誤解、需要重新理解的特點。

---

2. 即英文所謂“statism”，中文一般將此詞譯為「國家主義」。但「國家主義」詞義不明確，易與「民族主義」相混淆（一般中國人常將「民族」與「國家」相混，如常將作為外國公民的海外華人如新加坡人等說成「中國人」），未能明確表示其特定的政治、經濟或社會制度特色（即由國家政權控制社會經濟，故商務印書館《英華大詞典》亦譯「國治主義」）。所以，我在此改譯「國權主義」，表明其強調國家權力高於公民權利和人民主權的特色（上海譯文出版社《英漢大詞典》譯作「中央集權論」和「國家主權主義」）。上面括弧中提到的兩種譯法與我的譯法相通，但略嫌未能顯明“statism”的「國家至上」及其同「民權主義」相對的意涵。

3. 關於二者的關聯，即舊譯「國家主義」同「民族主義」的關聯，可參考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的《簡明社會科學辭典》，詞條「國家主義」：「灌輸抽象的國家概念和『愛國精神』，以維護剝削階級國家利益的思想。狹隘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宣揚『國家至上』，個人依國家而存在……鼓吹本民族比其他民族優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的《政治學辭典》，詞條「國家主義」條，釋義與此類似。

儘管在先秦時代，中國人的「天下」意識遠遠多於「民族」意識，[4]但在那個「民族主義」遠未誕生的時代，某種粗淺的「國權主義」就已經呈現。西周時期，「中國人」的眼界所及，主要是文化大體類似（亦即大體屬於同一民族）的周王（即「天子」）統治下的「天下」，而天下的土地和人民全都屬於周王，由王所執掌的國家政權完全控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5]東周以後，所謂「國」主要指周天子的「天下」的秦、晉、齊、楚等各個「封國」，就是說，在中國大地上（當時的「中國」基本上是地理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民族意識（「夷夏」之別）還在萌芽之時，國權意識（「齊楚秦晉」之別）就已十分清晰而突出了。實際上，早在先秦時期，相對於原初朦朧的「民族主義」，漸趨成熟的「國權主義」就已經佔據了主導地位。

隨着秦帝國絕對專制制度的建立，以及漢帝國的「漢襲秦制」和兩千多年來所有統治者[6]對這一制度的沿襲和加強，國權主義完全成熟並日益強大，成了中國大地上無所不能、令人畏懼的「利維坦」（Leviathan）。春秋戰國時期，齊、楚、秦、晉等「國」的君權或國權至少理論上還是有限的（不能超越「天子」，如沒有「祭天」之權），[7]

4. 在當代中國強調這一現象並宣揚用「天下主義」取代民族主義的著述，主要是盛洪的〈從民族主義到天下主義〉，載樂山主編，《潛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但是應該指出，這種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雅利安人（Aryan）進入後的印度人和希臘化時代的希臘人和羅馬人，也同先秦時代的中國人一樣，主要是以文化高低（「文明」或「野蠻」）來分別人群的。這大概是當時文化發展程度較高的民族的通例。然而用現代標準來看，這種現象也包含着民族文化優越感的成分。
5. 甚至連宗教上的最高祭祀權也屬於王權——「不王不禘」，「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禮記．王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將那時的中國社會定性為「奴隸社會」。「臣」的本義是「奴隸」，按這句名言的說法，奴隸主只有一人，即國君。
6. 在袁世凱稱帝失敗以前，兩千年中幾乎所有統治這片大地的人都要「稱帝」。
7. 有意思的是，「天子」在這方面也得接受制約——周王如果輕忽了祭天的職責，諸侯可以此為由討伐他。最重要的是，周王一般不干預諸侯國的事務。

秦以後君權則沒有了限制。這種國權主義具有秦朝以前的中國和所有時代的歐洲都沒有的特徵，即實行馬克思所謂「人人為奴的奴隸制」或「普遍的奴隸制」，即「國家奴隸制」。[8]直到最近的中國《物權法》經歷重重障礙終於通過為止，中國人民的財產權甚至在紙面上都毫無保障，人民的財產實際上隨時可以被朝廷或官府以「國家」名義徵用，以至沒收。由於國家對上自廷臣下至農民的財產和人身都擁有最高的支配權，連中國人所謂「地主」即「佔有土地的農民」，也不過是統治者的「實際上的財產，也就是奴隸而已」。[9]馬克思解釋這種不同於歐洲任何時期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和社會現象說：「在這裏，國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這裏，主權就是在全國範圍內集中的土地所有權。但因此，那時也就沒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權，雖然存在着對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佔有權和使用權。」[10]恩格斯在談到「亞細亞社會」中的國家奴役時更說：奴役的範圍所包括的「與其說是徵用群眾的土地，不如說是徵用他們的人身」。[11]與此密切相關的是人民在政治上的無權，因為人民的財產不具有「權力性」而只有「收益性」，[12]故而不論財產多少，「都不能使財產持有人通過以財產為基礎的組織和行動來控制國家的權力，從而形成對專制政權的威脅」，[13]儘管私有財產持有者中的一些人「可以成為難以置

8. 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三卷，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頁 395。
9. 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頁 393。
10. 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三卷，頁 891。
11. 恩格斯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前言〉，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 387。
12. 魏特夫著，徐式谷、奚瑞森、鄒如山等譯，《東方專制主義：對於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 8。
13. 同上，頁 7。

信的富豪，少數人還享有顯赫地位，但他們在政治上仍然是軟弱的、無足輕重的」。[14]

十分有趣的是，西方學者用《聖經》中的海中怪獸「利維坦」，作為權力集中的君主國家之象徵，[15]而中國皇帝們也竟然自己採用了中國傳說中與之十分類似的兇猛動物「龍」[16]，來作為自己的「國權主義」之象徵。這種不約而同的象徵確實非常貼切。然而奇怪的是，自稱「龍的傳人」的人們似乎忘記了兩個基本事實：第一，龍本指一種兇惡吃人為害百姓的怪獸，中國歷代傳說中的許多英雄之所以成為千古傳頌的英雄，恰恰是因為他們勇敢地與「蛟龍」（即惡鱷）搏鬥而擊殺這種怪獸，為民除害；[17]第二，龍絕對不是廣大中國人民的象徵，而只是統治人民的皇帝的象徵，在這種象徵具有實際意義的傳統社會，皇帝之外的任何中國人使用龍這一象徵或自稱「龍的傳人」，恰恰只會導致「龍顏震怒」，會遭到無情的殺戮。換言之，對廣大人民來說，使用這一象徵就意味着惡運或凶兆！

另一方面，在中國或由一個政權統治或有多個政權並存的這兩千多年歷史中，在同周邊民族的和平交往、緊張衝突和殊死戰爭中，秦人[18]或漢人[19]或中國人自然會加強自

14. 同上，頁 8。
15. 最著名的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的名著《利維坦》（*Leviathan*）。
16. 《聖經》所說的利維坦是一種身披鱗甲的巨大猙獰的「鱷魚」類（《約伯記》41: 1-34）或「蛇、龍」類（《以賽亞書》27:1）怪獸。而中國傳說的龍，其實是指一種兇惡而會吃人的鱷魚，參見何新，《龍．神話與真相》（北京：時事出版社，2007），頁 13-15。而且同「鬼」、「畏」、「惡」等「陰氣賊害」的意思緊密相關。（何新，《龍．神話與真相》，頁 126。）
17. 何新，《龍．神話與真相》，頁 27-28。
18. 「秦人」本為秦國（Chin）人，曾與西邊的「戎」長期衝突，但至少在戰國時代，其本身的文化更接近大中原地區其他六國。儘管以之代表中國人（Chinese）不是毫無理由，但它起初畢竟只是側重「國權」之別而非文化之別的「七國」之一，故“Chinese”一名似乎折射出中國人的民族概念中的國權概念因素。
19. 「漢人」同「唐人」一樣，來源於朝代名。「漢」和「唐」起初只是「漢王」和「唐王」統治的小國的名稱，只是因其和「秦」一樣，征服了全中國其他地區而形成大一統的「帝

身的民族意識，其中包括與周邊民族相比較而產生的文化差別意識和文化優越意識。如果說正常的群體文化差別觀念是一種理性民族主義，[20]那麼也可以說自大的群體文化優越觀念是一種極端民族主義。這種極端民族主義把不重視種族因素的「夷夏」之說，轉化成了重視種族差別的「南蠻」、「北胡」、「西狄」、「東夷」等等蔑稱，在兩千多年中，把四面八方所有其他民族都視為低我一等的「異類」。極端民族主義或民族沙文主義被國權主義所滲透、所主導、所利用，就會變成本來意義上的帝國主義，即主張以一個至高無上的政權（不論有無皇帝之名）去對多民族的廣大地區實行不受限制的統治。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統治者在其武力可以壓倒競爭者時，都要「稱帝」，都要不顧生靈塗炭而發動統一「天下」的戰爭，就是這種悲劇性傾向的明證。[21]

限於主題和篇幅，關於從古至今主導和扭曲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權主義對中國社會、經濟方面巨大的負面作用（例如在二十世紀開始的現代化過程中依然支撐着「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等等），我在此不擬論述。但是我們必須補充一點，即歷史上的國權主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思想開放時期所受到的批判並不徹底，而且主要限於知識界；在所謂「救亡壓倒啟蒙」的政治形勢下，「三民主義的」民國政府從制度和國家結構上對它的矯正或削弱，事實上被耽誤了。而二十世紀中葉開始的生產資

國」，其名稱才被用來指代整個民族。由此分析，這兩個名稱也折射出了中國人的「帝國」情結，或者說中國人「民族主義」中的「帝國主義」因素。

20. 正如「宗教」這一術語從西方傳入日本再傳入中國，已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但不能說中國古代沒有宗教現象；「民族主義」這一術語從西方傳入中國同樣很晚，但也不能因此就說民族主義這一現象在古代中國根本不存在，中國人的思想中根本沒有這一術語指稱的某些方面的內容。

21. 其他民族在大中原地區建立政權被稱為「（五胡）亂華」，漢族在其他民族地區建立政權卻被視為「正統」（現代所謂「合法」），並常常採取「改土歸流」之類沙文主義政策。

料國有化和計劃經濟制度，事實上大大強化了國權主義，使之從政治制度和所有權領域進入了日常的經濟操作過程，甚至日常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教育領域。[22]這種強化的力量和影響之大，使它得以延續到市場經濟改革多年之後的今天，甚至形成了深化和擴大改革的主要阻力。儘管今天中國的歷史處境已經發生了巨變，中國人面對的迫切難題，已經不是「國權」而是「民權」，即公民參與國家公共決策的權利方面的問題了。

還有一點應該補充的，是在中國歷史文化和語言環境中的「愛國主義」的特點。這一術語同「民族主義」一樣來自近代西方，但在將"patriotism"譯為「愛國主義」並固定下來之時，這個中文詞消除了其愛「父老」（patrios）的本意、弱化了其愛「鄉土」（country）的含義，只剩了愛「國家」（state）的意思，以致如果要回譯成英文，最好新創一個詞曰"philostatism"！於是，這個十分常用並成為重要意識形態的中文概念靠近了國權主義，甚至受到了國權主義的主導。由於愛國主義概念中的文化含義被政治含義消解，民族含義被國權含義消解，我們才會看到許多自稱愛國的中國民眾對台灣民眾的冷漠態度。

與上述兩點相關，還要補充最後一點：在中國現代史上有所謂「國家主義派」，其代表人物曾琦和李璜於一九二三年成立「中國青年黨」，一九二四年又與左舜生和余家菊一起組建「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他們認為當時「正當內亂和外患交迫的時候，欲救中國自然是要實行國家主

22. 值得深思的是：標榜民族主義的國民黨（其英文黨名為"Nationalist Party"）在其「五權憲法」結構和「三民主義」主張中都以「民權主義」削弱了「國權主義」；而主張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共產黨宣言》的主張）的共產黨反而加強了國權主義，這說明了國權主義確實不同於正常的民族主義。

義」，[23]又反對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也反對共產黨的唯物主義和其他主張。從歷史來看，「國家主義」派所說的內亂和外患交迫因而「國權」危殆的時代早已過去；從語義來看，他們把「國」和「家」二詞並聯成一種「主義」，很容易強化把公共領域同私人領域相混淆的觀念和現象，[24]而公私混淆的觀念和現象，正是社會現代化必須拋棄的。因此，儘管「國家主義」派作為一個政治派別在中國只是曇花一現（這同更廣義的國權主義觀念和制度一直存在是兩碼事），我們還是有必要警惕這個術語在思想上的誤導性，並用一個新的譯名即「國權主義」來討論有關現象。

總而言之，在涉及各國人民利益的諸多重大問題之解決亟需建構某種「全球治理」的當今時代，民族主義已經不合時宜，而極端民族主義則會帶來巨大禍害，這兩點已經為中國的少數有識之士所認識。但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從一開始就受到國權主義滲透、扭曲和主導，在中國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和語言環境中實際上已淪為「民族－國權主義」，[25]十分清晰地意識到這一點的人就更少（前述《潛流》一書的部分作者當可屬之）。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民族－國權主義，不但在涉外事務中造成本文「引子」中所述的荒謬現象，而且在國內事務中也成為深化和擴大改革的深層思想阻力。中國現代化需要以聯

23. 余家菊，《國家主義釋疑》，轉引自詞條「國家主義派」，哲學大辭典編輯委員會，《哲學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
24. 這在中國十分普遍。一篇反映這一點的文章說：「在中國人眼裏，『國家』這個詞，本身就意味着『國』不過是『家』的延伸……但坦率地說，由『家』延伸到『國』，並不是順理成章的事。」」（盧周來，〈從「家」到「國」〉，載《中國經營報》2009 年 6 月 15 日。）
25. 由於以國權主義為主導的民族主義已成為以民族主義為表像的國權主義，所以這個複合詞的順序應該倒轉一下，就是說，「國權主義」作為其實質，應該成為中心詞。

邦主義取代帝國主義，[26]以平權主義取代封建主義，以民主社會主義取代官僚資本主義，[27]這些都同這裏討論的話題有關。換言之，中國要成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發達的現代國家，還必須以全球－民權主義取代民族－國權主義。

二、中國的天主教會、基督教會與國權主義

由於民族－國權主義在中國具有久遠的歷史、主導的話語權、並佔有各方面的資源，現在幾乎看不到取代它的前景。但是，由於它對中國社會巨大的現實危害和對全球社會巨大的潛在危險，確實有必要仔細觀察一下當今中國正在變化的社會中其他的因素同它的關係。

正如詹金斯（Philip Jenkins）在觀察全球社會時發現，基督教的廣泛傳播是過去一百年當中全世界最重要的變化之一，[28]我們在觀察中國社會時也會發現，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內的基督教（我在此以「基督宗教」名之）的巨大發展，也是過去一百年當中全中國最重要的變化之一。[29]那麼，這一變化及其所涉及的基督宗教在中國的狀況，是否與民族－國權主義有關係？如果有，又是甚麼關係呢？

基督宗教在中國傳播的歷史已經證明，二者之間的確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

26. 孫中山曾設想在「憲政」階段實現地方自治，鄧小平也曾有類似設想。
27. 按照韋伯（Max Weber）的論證，中國人所謂「官僚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絕不是現代的理性的資本主義，見馬克斯·韋伯著，于曉、陳維綱等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三聯書店，1987），頁 7-14，「導言」。因此它的存在，不但不是「現代性」的證明，反而是「前現代性」的證明。
28. 參見詹金斯著，梁永安譯，《下一個基督王國：基督宗教全球化的來臨》（台北：立緒文化，2003）。
29. 信徒已增加百倍，從二十世紀初的幾十萬人發展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好幾千萬人（最低估計四千多萬，最高估計一億一千萬）；教會已完全中國化，從基本上全由西方傳教士建立並管理到基本上全由中國人建立並管理。

基督宗教第一次（七世紀，景教）進入中國，受到友好接待，得到順利傳播，是因為唐朝最高統治者（唐太宗及其幾代繼任者）開明的態度或開放的政策，後來遭到禁絕，是因為最高統治者（唐武宗）為政治目的消滅佛教而受牽連；第二次（十三世紀，天主教）進入中國，又受到友好接待並得到順利傳播，又是因為元朝最高統治者開明的態度或開放的政策，後來消失於中原，也是因為作為外族的統治者被趕走，而新的漢族統治者（明太祖及其後繼者）採取了更加專制的「國權主義」；第三次（十六世紀，天主教）進入中國，受到部分士大夫的友好接待和另一部分士大夫的激烈反對，是因為最高統治者（萬曆皇帝）的頑劣使得國權主義的君權走到極端，導致最高統治層的失效，[30]同時導致必然有歧見的次級統治層的作用加強，後來再次被禁，也是因為新的最高統治者（康熙皇帝）的一句批文。

一句話，基督宗教從七世紀到十九世紀以前在中國一千二百年間的三起三落，都同那些年間由君權代表的國權主義的態度直接相關，而且，最後的衰落都直接源於這種國權主義的負面作用。

基督宗教在十九世紀初葉（一八〇七年，新教傳入）到二十世紀中葉（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一百四十二年間，在中國速度不是很快、但卻相對自由的發展，正是中國的國權主義在巨大而激烈的內外衝突中越來越淡化的時期；在二十世紀中葉到「改革開放」以前的三十年間（1949-1978）的明顯衰落，又是一個國權主

30. 這期間傳教士的活動主要興起於明神宗治下，他在位四十九年，久不上朝，最長一次上朝間隔時間達二十五年（1589-1615）！中央政府六部有五個部沒有部長，犯人被關二十年無人審問，宰相辭職一百二十次沒有回音，甚至全體大臣跪求為後金前線的敗軍增援，也無回音！參見柏揚，《中國人史綱》（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7），頁 774-777。

義大大強化的時期；在一九七九年至今三十年間的迅速發展，卻正是「改革開放」導致國權主義在很大程度上逐步退出經濟領域，而社會生活領域也在一定程度上逐步擺脫國權主義的時期，後一方面同基督宗教發展的關係尤為直接。一句話，基督宗教從十九世紀初到二十世紀初二百年間極其曲折的戲劇性發展，也同這些年間分別由清朝王室、北洋政府、國民黨和共產黨所代表的國權主義密切相關，而且二者的關聯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某種負相關的特徵。

所以，從歷史事實來看（儘管一般基督徒不一定都意識到），基督宗教同民族－國權主義的關係一般而言是對立的，但主要是同其中的國權主義因素，而不是民族主義因素相對立。因為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三個時期基本的歷史事實：在基督宗教相對自由發展的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民族主義也一直在迅速上升；在基督宗教明顯衰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狹隘民族主義」受到批判而「共產主義國際主義」得到宣傳；在基督宗教迅速發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三十年，民族主義在重新興起，愛國主義在得到宣傳。如果再注意到從孫中山到馬相伯、從馮玉祥到晏陽初等無數基督徒的愛國精神和愛國行為，我們至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基督宗教的發展與正常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在中國完全可以並行不悖、和平共處。[31]

歷史事實總是混雜着種種複雜的因素。如果從純粹的理論或教義來看，基督宗教同民族－國權主義即以民族主義為表像的國權主義的關係，其對立性質則十分清楚。

31.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非基運動算一個例外，但那場運動中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確實帶有濃厚的非理性和極端情緒。

就其宗教本質而言，基督宗教追求的目標不在此世，因為耶穌基督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32]這實際上使此世的任何國家制度都同其他事物一樣相對化了。就其關心世間事務的一面而言，基督宗教也為國家權力指出了明確的界限，因為耶穌基督說：「凱撒的物當歸凱撒；上帝的物當歸上帝。」[33]這實際上是在反對以君權為代表的國家權力可以毫無限制的「國權主義」。更不用說，把基督宗教對「公義」的追求和對人的尊重結合起來考慮，再將其對弱勢人群的關愛結合起來考慮，它同「國權主義」的對立和對「民權主義」的支持就更順理成章。由此，我們才會看到，在羅馬帝國的幾百年間，基督教會冒着遭受大迫害的風險，反對把皇帝當成神明敬拜，許多基督徒甘願被扔進鬥獸場，而拒絕服從把皇權絕對化偶像化的帝國政策；中世紀的一千年間，基督教會實際上構成了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各國君主權力的最大制約；在宗教改革之後的幾百年間，以加爾文主義為代表的強調兩個國度並立的思想，通過現代政治的理論原則和制度創新，造成了限制國權主義的現代憲政文明，而且，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會在曲折複雜的政教衝突之後，終於同現代世俗思想達成了在政治體制上「政教分離」的基本共識。這項現代原則在禁止教會直接干預政府事務的同時，也禁止政府干預宗教事務。換言之，這項原則本身是對毫無限制的國權主義的一種否定，是促使人類社會超越國權主義的一大進步。

就今日中國的政教關係而言，「現行的宗教管理體制是由政府設立宗教事務管理機構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同時通過政府認可的宗教團體對宗教界人士、宗教活動場所

32. 《約翰福音》十八章 36 節。就佛教和道教的精神而言，它們在這一點上應該與基督宗教一致，即不把世間的國度視為終極關切。
33. 《馬太福音》二十二章 21 節；《馬可福音》十二章 17 節；《路加福音》二十章 25 節。

和宗教活動進行控制……其目的主要在於確保國家對宗教的控制」。[34]這種「國家控制宗教型」的政教關係和體制，必然會加劇「宗教組織與政府之間的張力」。[35]這又必然在中國造成包括天主教與新教在內的基督宗教同國權主義在實際上的對立。

就天主教而言，所謂「地下教會」出現和發展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眾多的教友按照教會的神聖傳統和自己的宗教信念，認為在宗教事務（包括聖職委任）上，必須與普世羅馬教會保持「共融」，應該服從教廷而不是世俗政權。換言之，中國現行的對待天主教的政策違背了歷史常識，[36]而與天主教的本質相對立，這使得大量天主教徒因與這種國權主義對立而不得不被迫轉入「地下」。就筆者個人的了解，即便是「地上」的天主教徒，只要真是信仰虔誠的教徒，也在內心裏認為在宗教事務上應服從教廷，其中大量神職人員甚至在私下去尋求教廷對其聖職的認可。

就基督新教而言，所謂「家庭教會」出現和發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樣是眾多的信眾按照教會的傳統和自己的信仰，認為在宗教事務（包括牧職的委任和教會的管理）上，只能服從上帝和《聖經》的權威，而不是任何人間的權威（不論是羅馬教廷的權威還是世俗政府的權威）。同樣，中國現行對待基督新教的政策也違背了歷史常識，[37]而與新教的本質相對立，這同樣使得大量新教徒因與這種國權主義相對立而不得不被迫成為「地下」的「家庭教會」

34. 劉澎，《關於中國宗教問題的戰略思考》（第六屆宗教社會科學年會論文，2007 年 7 月）。
35. 同上。
36. 歷史常識告訴我們：天主教如果背離羅馬教廷，就變成了新教而不再是天主教，所以，要求天主教徒不服從羅馬教廷的權威，就等於要求天主教徒不做天主教徒。
37. 歷史常識告訴我們，基督新教之所以成為「新教」，就是因為它主張除了服從上帝和《聖經》，在宗教上不應服從任何人間權威（即使是教宗權威），所以，要求新教徒在宗教上服從世俗的行政管理，就等於要求新教徒不做新教徒。

成員。關於「地上」的所謂「三自」，我們應該記住，從全國到地方各級的「兩會」，其實並不是教會，實際上只是政府通過它對基督教進行「管理」的某種行政化機構。正因為如此，它同宗教局的管理與被管理關係，它同受它控制的那些教會的管理與被管理關係，並不反映新教教會的宗教特點。這也就難怪，反映新教教會特點的「家庭教會」普遍拒絕它的領導，而且同它的僵化制度相比，呈現出靈活多樣、貼近信眾、因而蓬勃發展的態勢。這種態勢同新教數百年來在全世界發展的趨勢一致，因為它符合新教的本質，即在宗教上以上帝和《聖經》而不是人間自上而下的行政機構為最高權威，因而同任何國權主義相對立的本質。

當然，人人都能觀察到，中國的基督教「兩會」本身以及構成各級兩會的基督徒對於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從來都是完全順服的；天主教各級「愛國會」及其中的天主教徒也是如此。不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的各級機構，從來都按照黨和政府的指示，向廣大信徒宣傳「愛國主義」，這一點，僅從它們自身的名稱中都有「愛國」二字，從它們永遠不變的口號「愛國愛教」的用詞順序，從它們的所有出版物（儘管被禁止進入市場）都能看到。它們的宣傳和教育也不是完全無效的，這一點，至少從多數基督徒的公開言論可以看到，甚至從海外華人教會中某些狹隘民族主義現象，[38]也可以看到。另外我們還會觀察到，前述基督

38. 參見任不寐，〈民族主義——中國教會的最大試探〉（www.blog.kuanye.net/?27007/viewspace-17814，瀏覽於 2011 年 5 月 25 日）；YIPPIEE，〈現代性、民族主義和傳統文化——基督教在中國所面對的重大挑戰〉（www.jidunet.cn/bbs/viewthread.php?tid=9165，瀏覽於 2011 年 5 月 25 日）以及相關轉貼。後一篇文章提到，在中國「隸屬於這兩個組織（指『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天主教愛國會』）的教會……同中國民族主義積極合作」，也許把這種關係說成「完全順服」更合適一些；它又認為「地下教會和家庭教會則強調信仰的普世性，採取的是抗拒政府或不參與的策略」，應該說這種所謂「策略」並非出於有意，而是迫於無奈。

宗教與國權主義的天然對立，在大多數基督徒那裏，不論是官方認可的教會還是官方不承認的教會的基督徒那裏，都是下意識的，甚至還處於意識之外。所有這一切都使我們可以說，同國權主義相對立的基督宗教，在中國真的不過像一隻馴良的鴿子！

鴿子不單馴良，而且弱小，它當然不會也不能與龍爭戰。它不會也不能威脅任何人。在此用鴿子來比喻基督宗教，不單有《聖經》的依據，[39]而且有現實的適切性。

從中國基督宗教的現狀來看，教會不但力量弱小，而且相互孤立、毫不統一（前面說過，基督新教從來就堅持各自為政互不隸屬的傳統），絕大多數教會不但不採取任何政治行動，甚至不交流對政治問題的觀點，甚至根本不談論政治話題。所以，如果說到一個一個的教會（不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不論是所謂「官方教會」，還是所謂「地下教會」、「家庭教會」），說到一個一個的基督徒，在政治問題上的狀態或力量或地位，那真像是一群一群的鴿子，一隻一隻的鴿子。

但是，鴿子就是鴿子；鴿子不論作為整體還是作為個體，同龍的區別是明顯的，同龍的距離是遙遠的。

這，就是基督宗教同當代中國社會中的其他因素（例如知識分子群體之類），在其與國權主義的關係上大不相同的地方。

結語：龍？還是鴿子？

前面說過，把龍作為中國人或漢民族象徵的說法[40]忽略了兩個基本事實：第一，龍從來就是皇帝即統治者而非人

39. 聖靈「彷彿鴿子」（《馬太福音》3:16，《馬可福音》1:10，《路加福音》3:22，《約翰福音》1:32）；耶穌教門徒要「馴良像鴿子」（《馬太福音》10:16）。

民即被統治者的象徵；第二，龍本指一種兇殘吃人的鱷類怪獸，在成為想象物之後也帶有翻雲覆雨任意胡為的特性。因此，龍，作為與「民權主義」對立的「國權主義」或魏特夫所謂「東方專制主義」或馬克思所謂「亞細亞制度」的象徵符號，的確非常合適。但是，如果中國人覺得必須有一個民族象徵符號，那麼，龍恰恰是最不適合的一個。

一個民族的象徵符號，最好能反映這個民族最優秀的、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特徵或民族性格。我想，中國人或漢民族的眾多文化特徵或民族性格中，最優秀的、具有普世價值即可為全世界人民所贊同的，莫過於「和而不同」的主張、「和為貴」的性格或「和諧」的理念，這些說法都內含一個「和」字，都以「和平」為基礎，以「和平」為目標。

現在，全世界人民早已不顧「鴿子」這一象徵符號起源於何處，在從幼稚園的圖畫到奧運會的儀式等種種不同的場合，全都毫無歧義地認可了鴿子作為和平的象徵。那麼，中國人或漢民族如果真有相容天下的博大胸懷，真有追求和諧的崇高理念，為甚麼不可以用鴿子，一群飛向藍天的鴿子，來作為自己的象徵呢？

關鍵詞：當代中國　民族主義　國權主義　天主教　基督教

作者電郵地址：heguanghuster@gmail.com

40. 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徵更加不妥，因為按照現在中國官方的也是相當普及的理解，「中華民族」指的是包括五十六個民族在內的「多元一體」的龐大集合，其中許多民族（例如信仰伊斯蘭教的十個民族）從來不認同以龍作為自己民族的象徵。

The Dragon and the Dove: Nationalism, State Power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

HE Guanghu
Ph.D.,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ofessor of Religious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By pointing out the irrational reactions of many Chinese people to some international events such as September 11 Traged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to state power in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of China. It concludes that the former has been overwhelmed by the latter which has dragon as its symbol. On the other hand, the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churches are like doves in obeying the government, though they are in opposition to, at least aloof to state power,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Christianity.

Keywords: Contemporary China; Nationalism; Statism; 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